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

ZHONGGUO XINWEN CHUANBOXUE YANJIU ZUIXIN BAOGAO

最新报告 (2009)

童 兵/主编

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成果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

ZHONGGUO XINWEN CHUANBOXUE YANJIU ZUIXIN BAOGAO

最新报告

(2009)

童 兵 / 主 编
夏德元 / 副主编
杨海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 2009 / 童兵主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309-06784-2

I. 中… II. 童… III. 新闻学: 传播学-研究报告-中国-2009 IV. G2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4153 号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 2009

童 兵 主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 (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 (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 (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姜 华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890 × 1240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563 千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9-06784-2 / G · 842
定 价 4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本书《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2009)》是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国家创新基地(简称985基地)成立后组织编写的第四本年度研究报告。前已声明,我们编写这本年度研究报告的宗旨,是鸟瞰式地向人们展示过去一年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科科学研究的全貌,包括这一年研究的重点和亮点,主要研究领域、重要学术论文及观点,重要学术会议和公开出版的新闻传播学类专著与教材。

过去一年(2008)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有三个重点及亮点:

一是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对新闻改革30年和中国新闻传播教育30年展开回顾和反思。其中代表性成果是“一本书”和“一个会”,书是《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新闻学与传播学卷);会是由教育部从事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8个“国家队”,即4个985国家创新基地和4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以及中国新闻史学会、华中科技大学省重点研究基地联合召开的,会议名称为“技术与制度:中国传媒改革开放3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二是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公开和新闻报道的研究。由于2008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研究对象,也向研究者提出了讨论与改进突发公共事件的严峻任务。应该指出,2008年中国高校学者们对于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公开和新闻报道,以及风险社会的特征及规律的研究,论文数量和研究深度上有了新的突破。

三是围绕胡锦涛考察人民日报社重要讲话展开的研究。无论对胡锦涛新闻观点的揭示,还是对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发展的梳理,都有新的成果。特别是对胡锦涛下列观点展开了较为集中和深入的探讨: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努力使新闻宣传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要从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出发,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新趋势,努力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

新闻学仍是2008年研究论题最集中、论文数量最多的一个二级学科,主要研究领域涵盖新闻理论、中国新闻事业史、外国新闻事业史、新闻实务、新闻政策与新闻法规五个方向。新闻理论研究中,学者们较为关注个人传播时代与公民新闻,认为公民新闻对普通公民“新闻生产力”的开发正在改写新闻传播的历史。由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公民知情权与表达权的研究成为这一年度的亮点。在2007年新闻史学界对新闻史研究的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在新的一年里集中到对新闻史研

究中“本体”缺位的讨论,认为重回新闻史研究本位也许是冲出当前学术困境的突破口。史学界部分学者还关注到近年展开的几次学术争鸣,其中既涉及学术讨论应持的态度,又强调科学方法的意义。本书的撰写者出于一个特别的视角,观察与评述了若干年来外国新闻史研究的情况,读者们也许会有兴趣。体育报道和奥运报道是2008年新闻实务研究的一个重点,学者们有新的视角和新的结论。

传播学研究中,学者们认为30年传播学研究所走过的路程可以说是:一半是惊喜,一半是担忧。喜的是传播学已成为一门“显学”,忧的是如何突破功能主义传统的束缚以及如何克服缺乏规范、低水平重复等弊病。传播学在新的一年里在基本理论、受众、新媒体、网络研究等方向有新的进展,在广告、公共关系研究方面有新的成果。

和过去一样,广播、电视、主持人三块构成广播电视研究的主要领域,由于突发公共事件推动,广播研究有若干新的进展。

同样,传媒经济学、媒介经营管理依然是传媒经营管理的两大块主要领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有些课题的研究呈现新的视角和新的观点。

编辑出版研究在过去一年分别在编辑理论和出版理论方面展开。数字出版和出版产业是这个领域的重点。不足的是,高校学者们对版权及版权贸易研究关注严重不足。

张晓锋博士同以往一样,全面地为我们提供了2008年高校主持召开的重要学术会议,各主要出版社组织出版的新闻学与传播学代表性的著作与教材的清单。

本年度报告仍沿用原先的成书方法,即请选修我执教的《新闻传播学前沿》课的全体博士研究生对2008年发表在各主要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及主要高校学报上的论文进行地毯式的检索、梳理,然后请本书副主编夏德元进行初步的整理。我复阅之后又请德元仔细修改,其间安排另一位副主编杨海军协助德元完成这项工作。请教育部社科委委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丁淦林教授和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丁柏铨教授审读本书的总报告,我根据两位教授的意见对总报告再次进行修改。这里特向丁淦林和丁柏铨两位教授表达深深的敬意与谢忱。

尽管我的同事和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同学都以认真负责的科学态度从事本报告的研究与撰稿,但由于期刊太多,论文太多,作者太多,仍不免会疏漏少数学者的重要论文,对论文观点的提炼也可能不尽精当,对一些专业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出版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著作及教材也可能检索不全面。本报告对目前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许找得不准,分析有失偏颇。所有这一切,作为主编,我应承担主要责任,欢迎广大读者尤其是相关学者专家批评指正。

最后,向参与本年度报告的全体作者团队在研究与编撰工作中表现出来的科学态度与认真负责的学风,以及相互间的协作支援精神,表达我的由衷的敬意和深深的感谢。

童兵

2009年6月11日于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目 录

前言	童 兵 1
----------	-------

第一部分 总 报 告

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报告(2009)	2
---------------------------	---

第二部分 新闻学研究

新闻学理论研究	34
中国新闻事业历史与现状研究	46
外国新闻事业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58
新闻实务研究	73
新闻政策与新闻法规研究	80
新闻伦理与职业道德研究	90
突发事件报道与新闻业务研究	98
突发事件报道典型案例研究	109
舆论与舆论监督研究	126
新闻教育研究	134

第三部分 传播学研究

传播学理论研究	148
媒介效果研究	157
受众研究	165
网络传播研究	173
新媒体研究	182
广告研究	196
公共关系研究	211
媒介文化研究	225

第四部分 广播电视研究

广播研究	236
电视研究	243
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研究	256

第五部分 传媒经济管理与体制改革研究

传媒经济学研究	262
媒介经营管理研究	272
新闻传媒体制改革研究	283

第六部分 编辑出版与文化产业研究

编辑理论与实务研究	294
出版理论与实务研究	308
出版产业研究	327
文化产业研究	339
附录一 2008 年新闻传播学术著作与教材概况	345
附录二 2008 年新闻传播学术会议概况	351

第一部分 总 报 告

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报告(2009)

2008 年中国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呈现三大特点:

一是时值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许多著作和论文对中国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在这 30 年快速发展与学术成就作了全面梳理和分析。

二是 2008 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从年初的冰雪灾害到年中的汶川大地震,再到年底的问题奶粉事件、坝坝事件和全球性金融危机袭来。由这些突发公共事件的推动,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和风险社会研究较前几年有新的突破和深化。

三是 2008 年 6 月 20 日胡锦涛总书记到人民日报社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胡锦涛的讲话全面展示了他的新闻思想,集中反映了党的十七大以来的新闻理念和新闻政策。在此推动下,学者们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对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新闻理念、新闻政策作了系统梳理,对新形势下舆论引导能力建设以及社情民意的新形态作了全面深入的阐述。

一、学术研究的重点和亮点

1. 新闻改革 30 年总结:“一本书”和“一个会”

2008 年中国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标志性成果之一,是围绕总结 30 年新闻改革与学术研究而出版的一本意义深刻的书和一个成功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一本书”是《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新闻学与传播学卷),丛书主编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新闻学与传播学卷主编为童兵。新闻学与传播学卷共四章:第一章中国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 30 年发展概况;第二章新闻学基础研究的进展及成果;第三章新闻学应用研究的深化及成果;第四章传播学的引进、研究及主要成果。结语之后附录有大事记。

第一章集中总结和分析新闻学与传播学 30 年重大进展的五个方面的动力与源泉。这就是: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对中国新闻改革的推动,新的科技革命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支持,新时期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的突飞猛进,跨文化传播和中外新闻学术交流的加强,思想解放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创新的呼唤。其中论述思想解放对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创新的意义,首先是新闻改革实践提出的一系列重大课题亟待理论界回答,成为对研究的最大动力。其次又强调破解理论难题要求研究者敢于碰硬攻坚。

该书指出,中国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 30 年来的重大进展以以下五个方面的成就为标志。这就是:学科地位擢升使新闻学与传播学成为显学,回答传播业可持续发展重大问题的能力,拥有优秀的学术研究团队和厚实的科研平台,科学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国际化有所提升,现代科学研究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初步形成。

该书结语集中论述新闻学与传播学 30 年学术发展的基本经验和未来展望。其中基本经验是:

第一,有中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坚强支持,有中国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社会巨变等宏观大环境的全面支撑。

第二,不断解放思想,放大胆子,走稳路子,当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发展的促进派。

第三,打开国门,加强与海外学人的交流,广泛吸纳各种学说和成果,用以填补、修正、丰富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

第四,抓紧基础性研究不放,兼顾应用性研究,夯实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发展的根基。

第五,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切实改进研究方法,保障中国高校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发展与学术繁荣。

在充分肯定基本经验的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第一,在基本概念、范畴和深入研究方面,尤其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基础理论框架的建构上下工夫不够。

第二,学术自觉和理论胆略欠缺,致使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独立性不够,能够成为共识的学科理论体系尚未建立起来。

第三,学术水平上乘的标志性成果不多,显示中国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发展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

该书指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媒介化社会建设的深化,国家、社会、新闻传媒业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多。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又处于党中央和中央政府重点关注的学科之中,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为此,首先,要下工夫做好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的规划。其次,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全国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应该组织较强的联合学术团队,以构建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体系、理论框架为核心,集中力量深化对基本概念、基本范畴、核心体系的攻关研究。再次,要继续采取更加有力的举措,推动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工作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学术自觉、学者风骨、理论胆略、创新能力等方面有更大的提升。最后,要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标志性成果的问世创造良好的条件。

“一个会议”就是“技术与制度:中国传媒改革开放3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年6月14日至15日在复旦大学召开。这次会议由教育部从事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8个“国家队”,即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等4个“985”国家创新研究基地和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4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以及中国新闻史学会、华中科技大学省重点研究基地10家学术部门联合召开,由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办。这次会议是由新闻教育界同新闻实务界联手,围绕国家改革开放和新闻改革30年举办的首次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120多名专家、学者、传媒领军人物出席会议。与会者就传媒改革与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新闻传媒技术与传媒改革、传媒改革与传媒变迁、传媒改革与传媒产业、传媒改革与舆论监督、传媒改革与政治、传媒变迁与媒介文化、传媒改革与中国广告、传媒改革与传播观念、传媒改革与当前传播实践等展开深入探讨。

这个会开得主题集中鲜明,宣读的论文透彻深刻,充分反映了学者、专家们对30年新闻改革中同传播技术与制度调适等一系列相关议题的研究成果。

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的钟沛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张博树联合提交的论文《推进新闻体制改革,重构现代新闻制度》提出,现代新闻制度的核心是通过新闻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权。中国现代新闻制度的建设曾经取得过不小的成就,后来却走了一段弯

路。如今,我们面临着重构现代新闻制度的历史任务。他们主张从党政分开、政府依法对媒体实施宏观管理、创设有利于舆论监督的制度安排、允许和鼓励民间办报办刊、建设互联网公民社会、把新闻立法提上议事日程等几个方面,通过渐进改革实现这种重构。

复旦大学童兵教授提交的论文《突破体制瓶颈,推进新闻改革》首先提出经过30年新闻改革,中国新闻传播业在以下五个方面有了长足发展和进步:新闻传播业实力增强,有力保证了整个中国文化生产力的壮大;努力创新传媒体制,正在营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大国崛起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研究结出硕果,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趋向繁荣;新闻从业人员和新闻学术队伍的梯队建设初有成效。论文也指出事业发展、学科进步和学术研究中存在的五个问题:第一,中国的新闻改革受三个改革和三个文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物质文明建设;文化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发展不平衡和改革力度不相同的影响。第二,新闻改革遇到体制和机制改革的攻坚瓶颈。第三,推进新闻改革当前缺少强大的推动力。第四,目前改革实践和理论创新的互动互补、融合共进缺少动力又无规划。第五,新闻传媒从业人员的新闻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缺失,新闻学术研究科学规范的缺失,严重阻碍着传媒公信力和新闻科学权威性的重塑、维护和张扬。

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和吕宇翔、张铮联合提交的论文《新媒体与传媒改革:1978—2008》,从新媒体的视角,对我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新媒体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分析。从制度建设、产业发展、社会形态、文化创新等几个方面,对新媒体在传媒改革30年中所起的作用,其推动社会发展和受到的相应制约,与社会整体环境变化的相互影响等等,以事实和案例的方式进行了解读。文章还认为,新媒体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生产力,还是一种文化生产力,正是由于这种技术与文化的双重属性,使其在发展中与生产关系不断出现“适应—不适应—再适应”的过程,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改革的不断深化。

加拿大皇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加拿大政府卓越学者计划之“传播与社会研究卓越学者”文森特·莫斯可提交的论文《信息社会的社会理论与知识劳工》指出,传播学信息科技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其中包括使全球化成为可能的劳工经济奠定了基础。鉴于传播和信息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学者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如何诠释信息劳工及其得以产生的社会性质。论文论述了三种不同的构成今日信息社会的当代观点。相应的三种观点分别集中于数字资本主义、网络社会和作为政府范畴的自治的非物质劳动。作者在对各种代表性观点进行分析之后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两个世纪以来的论争,为我们理解由信息和传播科技塑造的社会提供了形形色色的观点和理论。很难确切地说,是否意味着是标志三个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之深度和广度的数字资本主义的增长?或者说它是否意味着由网络主宰的社会成长不仅强化而且挑战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原则?最后,难道答案就在第三种观点中吗?第三种观点主张新科技的发展胜过资本主义的吸收能力,而且这种非物质劳动将最终导向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即一种更加民主、更加开放,不再以市场规律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理论家长期以来一直质疑新科技会对变迁的世界有所贡献。不过对这些变迁的性质的看法,仰赖于对这些见仁见智的观点的理解。

台湾政治大学传理学院李瞻教授的论文《报业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关联性》对报业哲学的核心、报业理论的类别、目前报业制度的缺失等作了系统分析,做出了这样的结论:目前世界上任何国家报业

的实际表现都难令人满意;尤其色情、暴力的新闻报道,对社会风气、教育文化与社会犯罪,都有明显而深远的影响。有鉴于此,自20世纪中叶,许多国家的政府、国会、学术团体及著名作家,都纷纷提出改革报业的建议,但由于“新闻自由”的敏感性,以及报业由资本家所控制,因既得利益的垄断,致使报业的改革远未成功。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届30年,在经济方面已获得辉煌的成就。但报业的改革仍面临分歧的十字路口,所幸中国报业绝大部分系由党和政府所经营,但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干扰,可排除制度的商业化,并且完全依照近代报业改革的新观念,建立报业的公信力,以及符合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公共报业制度”,彻底根绝色情、暴力与犯罪新闻,完全服务公益,如此必可解除当前报业的困境,而成为世界报业制度的典范,为人类谋幸福。

南京大学丁柏铨教授提交的《扩大人民民主与实施新闻舆论监督关系论——执政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暨南大学董天策教授提交的《为舆论监督提供制度保障——知情权与表达权对舆论监督的意义》,上海大学戴元光教授和郑涵教授提交的《建构多元的文化传播体系,提高我国文化的传播能力》,武汉大学单波教授提交的《西方新闻传播观念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改革》等60余篇论文,使这次国际学术会议成为多学术视角聚焦、多元观点碰撞的高水平研讨会,不仅与会者反响热烈,在新闻传播学界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2. 围绕突发公共事件展开的研究及成果

当年的“非典事件”曾因传媒缺乏处理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的经验,给新闻传播界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导致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受到质疑,人们对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公开和及时报道给予了强烈关注。一些研究者认为,2007年在突发事件信息公开方面是个转机,并预测2008年将更有长足进步。不曾想,2008年中国政府和新闻传媒受到了极为严峻的考验,这一年,冰雪灾害、拉萨事件、汶川大地震、奥运会圣火传递、“三鹿”问题奶粉案等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接连发生,对中国媒体的因应之策提出极大挑战。而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的迂回与突破,也从多个方面、多个层次上改变了中国的传媒生态环境。在这个多事之秋,学界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方式与传播效果进行了一系列及时而深入的分析,相关研究的数量是近年来鲜见的,学术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

从总体上看,对于2008年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公开和新闻报道的学术研究大致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主要突发公共事件典型案例的解剖与分析,二是对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的基础理论、基本规律、报道特点等有了较为细致的考察与研究。

(1) 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的典型案例研究

① 关于冰雪灾害报道

2008年1月下旬开始,50年一遇的冰雪灾害席卷我国东部及南方19省、市,且与春运高峰交缠在一起,对交通运输、供水、用电、通讯等方面造成巨大影响。

研究者指出,对于电视媒体来说,这是一次直播新闻大演习,为稍后突发的汶川大地震以及北京奥运会报道积累了经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电视、网络信息传输受阻,广播的作用被重新发现并高度重视。中央台广播节目此次应对突发事件速度之快、播出时间之长,在中国广播史上都是第一次。网络等新媒体除了提供快速新闻,也给“草根记者”的个人新闻或感受提供了发布场所。同时,手机新媒体也在事件中发挥了补充信息、点对点传播的功能。业界在反思冰雪灾害报道中认识到存在的缺憾,主要表现在:缺乏对天气、环境、出行等信息的及时播报;缺乏批判精神——新闻媒体应当作

为政府与公众间的沟通渠道,不应仅仅满足于做政府部门的发言人或撰稿人;有将灾害新闻变成“歌功颂德”正面新闻的倾向;个别报道存在不够全面真实的问题,比如不同传媒对湖南与贵州受灾情形的报道,带给受众的信息差别非常大;新闻缺乏引领社会反思的力量^①。

② 关于拉萨“3·14”事件报道

研究者指出,“3·14”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在信息发布方面坐失良机。第一周里,除新华社的简短消息外,中国媒体对此一片静默;而在西藏的外国记者也被要求离开。随后,中国迅速在来势汹汹的负面国际舆论面前,陷于极度被动;西方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更逐渐从事件本身脱离出来,转向更为宏观、更加政治化的层面。部分西方媒体报道采取双重标准,引发大量片面报道。

研究者对此有这样的反思:首先,应该重视第一信源。在这一事件中,除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传媒,大多数国家媒体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多种新闻源的“客观”态度。这主要因为,事件发生的最初阶段,缺乏来自事件现场、地方政府、中国官方的消息源,使他们有理由或者不得不大量使用二手信源或者是来源不明的资料。同时也给了某些西方媒体玩弄舆论欺骗手段的机会。其次,要掌握争取话语主导权的技巧。“西方媒体中的中国形象,既是中国现实某种程度的反映,也是西方文化欲望在一定程度上上的反映。”当一国传媒报道别国事件时总会将之置于自己的新闻框架之下,这一框架通常受到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影响。对西方媒体而言,往往“希求全球范围的各种角度均被嵌入西方利益框架”。再次,认清国际舆论现实。我们不得不正视的是,无论西方媒体报道客观与否,他们对世界话语权的控制占有主导性优势却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国际传播中“‘西强我弱’的客观存在,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②。

③ 关于汶川大地震报道

汶川大地震震惊中外。这一惨烈的天灾,在猝不及防中引发灾难报道新闻公开的重大突破。人说这是“震”出来的新闻公开。特别是在地震甫一发生的前期救死扶伤报道中,国内媒体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精神。政府的信息公开程度也前所未有的。

研究者认为,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有如下特点:一是以开放的心态进行迅速及时的信息发布。及时而海量的震情及伤亡、救援、捐赠等信息传播,使媒体在社会总动员方面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二是从对外传播效果看,关于灾情信息,在第一时间形成以“我”为主的国际传播态势。三是成功地影响了国际传播的议程设置^③。

④ 关于北京奥运会报道

北京奥运会因循国际惯例,对所有境外记者开放自由采访,无需事先申报——这对中国比较严格的新闻管理政策而言,是一个重大突破。但国内媒体及官方对此还不适应,对一些奥运会上的突发事件(如假唱、刘翔因伤退赛),或信息发布及报道滞后,让西方媒体抢得先声;或习惯性失语;或应对失据而与境外记者时有摩擦。但就总体而言,国内媒体对奥运报道公开程度较高,国际反响颇佳。值得

① 参见井春野:《从南方雪灾事件看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责任缺失》,载《新闻知识》2008年第5期。

② 参见庄曦、方晓红:《全球传播场域中的认同壁垒——从〈纽约时报〉西藏“3·14”报道透视西方媒体“他者化”新闻框架》,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3期。

③ 参见方汉奇:《中国新闻史上里程碑式的灾难直播报道》,龚文彦:《国家形象的建构——从央视四川地震报道谈起》,均见梁晓涛主编:《震撼媒体回想——“5·12”汶川大地震备忘》,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注意的是,网络媒体在北京奥运会报道中影响力大增。众多新闻网站极为重视奥运报道,除了技术支撑手段大为提高,并开始获得现场采访机会,并在激烈的新闻竞争中推出广告战略同盟的策略,既有网站与网站的结盟,也有网站与传统媒体的结盟。各类媒体、各家媒体借奥运之机,达成新闻资源和报道手段的优势互补。

⑤ 关于问题奶粉报道

进入2008年9月,“三鹿”等多种品牌奶粉被惊爆含三聚氰胺,导致各地出现大量“结石宝宝”。与汶川大地震的报道相反,对这一重大食品安全恶性事件,地方政府先是封锁消息,而后被迫公开,结果导致“中国制造”的形象再度严重受损,也再一次暴露出政府危机公关能力的不足。有研究者指出,如果媒体能够发挥监督政府管理、监督组织运行的职能,以公众利益为旨归,发现尚存于细微的风险预兆并预警公众,“三鹿事件”不至一溃千里。

有研究者指出,目前中国食品安全报道还未走出不健全的信息传播模式:发现问题—媒体曝光—相关部门介入—检验、查处、定性—相关责任人处罚^①。一些研究者将食品安全报道放在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框架下进行分析,提出不少有别于以前的分析路径。

⑥ 关于“瓮安事件”报道

2008年6月22日,贵州瓮安县17岁初中学生李树芬被发现溺死于河中,当地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不被家属接受。因当地政府处置迟缓,6月28日引发了一场针对当地政府的群体性暴力事件。

研究者指出,“瓮安事件”虽然发生于西南一隅,但当地政府的处理方式却折射出各级地方政府的危机公关意识严重缺失,信息公开的意识极为薄弱。通过对“瓮安事件”各阶段政府危机公关行为的剖析,可为今后类似事件的处理寻找可资借鉴的经验。它与以往类似事件的结局最大的不同在于,当贵州省政府介入后,允许媒体公开报道,主动、及时向社会通报事件处理进展情况,将媒体视为危机传播的中心。除了党报为主的主流媒体,也重视网络舆论引导工作。

⑦ 关于恶性事故与矿难报道

2008年4月28日凌晨,胶济铁路周村至王村区间发生客运列车重特大出轨相撞事件,被认定为一起“典型的人为责任事故”。类似的“人为事故”还有“9·13”四川巴中特别重大交通事故、“9·20”深圳舞王俱乐部火灾事故。这类事故新闻报道及时、迅速、集中,媒体对责任认定、事故起因等分析明确。

有研究者认为,近年来新闻媒体对矿难事故报道的频率和力度不断提升,报道内容不断丰富,发挥了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应有的积极作用,同时媒体自身也经历了不断规范与完善的过程,由过去停留在事故再现或“冰山一角”式的报道,转变为深入矿难事故内部,发现原因,提出问题,为保护完善受害人权益,促进整个行业规范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媒体参与报道的自由度受到一定限制,政策法规支持力度不足,个别新闻从业人员素质不高,2008年山西矿难事故中出现了记者收取“封口费”的丑闻。

⑧ 关于金融危机报道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加重,全球卷入金融危机,其影响延续至今,对各国经济、贸易造成的困难为二

^① 参见曾理、叶慧珏:《尴尬的食品安全报道——从不规范的媒体行为到不健全的信息传播体系》,载《新闻记者》2008年第1期。

战后最严重。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从国际报道开始,逐渐深入到国内经济、金融、贸易、就业等多个方面。有一个从主观到回归客观报道、从“围观”到危机自觉、从盲目乐观或悲观到理性报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们初步的共识是:

第一,秉持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

第二,媒体必须平衡政府与公众利益。

第三,尊重事物发展规律,恪守新闻本位。

(2) 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一般规律研究

① 不同定位的媒体对突发事件报道角度有所不同

有研究者比较了《三湘都市报》和《南方周末》在冰雪报道方面的差异。在报道内容方面,前者以湖南省抗雪救灾进展情况和武警官兵的事迹为主;后者则主要分析雪灾给社会造成的影响、雪灾发生的原因和人民的遭遇。在报道风格方面,前者是日报,以消息为主,多采用连续报道的形式;后者是周报,深度报道居多,并注重系列性,以非事件性新闻居多。

造成两报差异的原因在于两报性质不同。《三湘都市报》属于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具有鲜明的党性,发挥喉舌功能是其主要功能定位。而《南方周末》则定位于党报的补充,倾向于做沟通知识分子和大众的桥梁。报纸的性质决定了报道的倾向和报道风格。比如,在批评性报道方面,《三湘都市报》将目标对准了某些违规事件,而《南方周末》则对体制原因进行反思^①。

② 中外媒体对中国突发事件报道的机制不同

有学者指出,美日等国在突发事件报道方面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机制,其相似的特点是: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反应积极,行动迅速;主流媒体报道理性,坚持公共利益第一原则;不渲染血腥恐怖;完善技术装备,制定较为完备的机制与预案。我国已进入高风险时代,研究者建议应抓紧建立突发事件报道应急机制,这一机制包括一整套组织机构以及作业流程的规范设计,如组织机构设置、应急作业流程、保障措施安排、报道效果评估以及培训演练计划等。就实际操作看,应制定专门“重大突发性事件报道应急预案手册”,对记者的人身安全、法律侵权、新闻伦理道德、事实的核实等问题作详细规定^②。另一位研究者认为,美国近年来对突发性事件报道的策略有所变化,主要是多媒体策略和求异策略。多媒体策略指美国报纸编辑思维从“印刷思维”向“多媒体思维”转变,调动多种视觉和听觉元素,形成多种媒体报道形态的策略,这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尤其有效。求异策略表现在重视平衡报道的速度和报道的质量,不同报纸根据自己定位选择侧重点,寻求特色报道^③。

③ 突发事件的报道策划

有学者指出,新闻媒体通过有效的新闻报道实现政府、媒介和公众之间的信息流动,实现传播效果的平稳着陆。策划框架包括基本原则和方案制订两个方面。基本原则除尊重事实和遵循国家颁布的《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之外,应特别注重新闻报道与事件发展的适应性。突发事件一般有潜伏期、爆发期、扩散期和痊愈期几个阶段,不同阶段,媒体报道的中心是不同的。针对不同阶段,媒体的报道方式和策略应有所变化。一般情况下,潜伏期——提前预警,爆发期——告知信息,扩散

① 参见胡振华:《对2008年冰雪灾害报道的比较分析》,载《新西部》2008年第8期。

② 参见王鹏进:《重大突发事件呼唤应急报道机制——从美日等国突发事件报道策略谈起》,载《视听界》2008年第4期。

③ 参见方洁:《美国报纸编辑报道突发事件的新趋势研究》,载《新闻与写作》2008年第2期。

期——协调社会,痊愈期——反思问责。在操作层面,研究者认为策划时应制订好具体的方案,大致是:第一步,了解事实,认清形势。做好事件核实与评估。第二步,分析事态,确定选题。这是策划的关键。第三步,实时监控,有效传播。注意信息发布内容、信息监控渠道、信息采集手段等环节。第四步,获取反馈,展开评估^①。

④ 不同媒体报道突发事件的不同优势与作用

有学者对纸质媒体应对突发事件报道需把握的五个要素作了分析,主要是:一是真实,还原事实真相;二是及时,记者应迅速到达现场,力求及时报道;三是平衡,集合多方面观点,使报道可信;四是细致,注重细节描写,使新闻更具感染力;五是新颖,寻找新切入点,增加新闻吸引力^②。

对电视报道突发事件的手法与特点,有学者提出了电视新闻报道修辞策略的观点。他认为,由于电视的巨大影响力及其所承担的任务——危机传播情况下新闻信息流的畅通和社会认同度,政府信誉与国家形象的建构和宣传任务,电视新闻报道应根据受众的需要,适时调整或改变信息传播方式及其话语倾向的行为与能力,这就是修辞敏感性。

有学者强调,广播在突发事件报道中具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广播不受时空限制、异地连线播报、交互性和伴随性强、运作成本低,对于突发性事件的应急报道很有活力。结合汶川大地震中的广播报道,广播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突破:第一时间公开报道,主题集中,报道灵活;发挥“贴身传播”优势,服务于受众群体;声音传播发挥了情感抚慰功能;对引导社会救灾作用巨大^③。

网络新闻传播对于突发事件报道具有重要作用。有学者以新华网为个案,指出网络新闻对突发事件的作用主要有:快速反应,时效性强,跟踪报道,全程关注;信息来源和传播范围广泛,网络使用者均有机会发布和获取信息;内容全方位,检索便捷,新闻事件透明化;对舆论的聚合效应十分突出,迅速使情绪和意见成为舆论^④。

另一位研究者认为,网络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优势是:多、快、好、省。多是网络新闻可链接、可扩展的信息海量;快是技术保证下的即时发布;好是一方面多媒体技术实现的良好传播效果,另一方面网络传播非强迫、可选择的特点使受众有良好的认同;省是网络新闻内容,取自互联网本身开放平台,实现资源共享^⑤。

⑤ 对突发事件报道中媒介角色和功能的反思

突发事件常常引发公共危机,给人民生命财产、社会生产以及相关行业带来严重危害。这对我国媒体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一方面,面对敏感的重大问题,媒体必须承担主旋律的宣传功能;另一方面,作为社会舆论机关,又必须显现媒介的社会功能——客观、真实地记录新闻事实。

学者们对突发事件报道中媒介责任缺失进行了反思。有学者指出,在雪灾报道中,部分媒介出现了失实、冷漠、低俗等现象,如灾情信息严重滞后、媒介批判精神丧失、把灾害新闻变成歌功颂德的正面新闻等。要合格地承担起媒体责任,研究者认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树立危机意识,准确预

① 参见王宏昌:《突发事件的报道策略》,载《新闻知识》2008年第4期。

② 参见黄蓓蓓:《纸媒体突发事件报道的五要素》,载《东南传播》2008年第3期。

③ 参见王宇:《论公共突发事件中广播应急媒体的特殊作用》,载《现代传播》2008年第4期。

④ 参见胡靓:《网络媒体在突发事件中的价值》,载《青年记者》2008年7月。

⑤ 参见王玉珠:《从汶川地震看互联网媒体突发事件报道的优势与不足》,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0期。

报危机信息;承担社会监督责任,第一时间报道突发事件;提升新闻业务,强化职业道德;体现人文关怀;引导社会反思^①。

3. 学习和研究胡锦涛考察人民日报社重要讲话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到人民日报社考察,发表了重要讲话。通篇讲话充满着思维创新、视角创新、理论创新和机制创新,是他主政全党工作以来对新闻宣传工作最全面、最深刻、最醒人耳目和最富有指导力量的一篇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文献。

胡锦涛特别强调,要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他要求,新形势下的新闻宣传工作要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更好地发挥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他还指出,“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新闻舆论领域的斗争更趋激烈,更趋复杂。在这样的状况下,新闻宣传工作的任务更为艰巨、责任更重大。

胡锦涛提出,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努力使新闻宣传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他要求从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出发,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新趋势,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宣传资源,努力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

胡锦涛强调,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

围绕胡锦涛重要讲话精神原则,中国高校学者们,如刘建明、郑保卫、陈力丹、丁柏铨、童兵等进行了认真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学者们指出,总书记站在总揽全局的高度,要求新闻传播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做到“五个创新”(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把握“三性”(时代性、规律性、创造性),要研究现状和受众心理、舆论分析、议程设置,要健全突发事件新闻报道机制。学者们感到高兴的是,这些新闻传播学界使用的概念,如新闻传播规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特点和功能、新形势下舆论引导新格局等,已经变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话语。在考察中,胡锦涛还在人民网通过强国论坛同网民交流。学者们认为,这表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网络媒体在现代执政中的作用。对于胡锦涛提出的积极运用网络媒体、正确引导网络舆论、提高网络舆论引导水平,学者们也发表了不少较深刻的意见,认为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直面公众的提问,彰显最高领导层对网络强大影响力的首肯,显示出官方对网络这块舆论阵地的高度重视。

二、学术论文及主要观点

1. 新闻学研究

(1) 新闻理论研究

^① 参见井春野:《从南方雪灾事件看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责任缺失》,载《新闻知识》2008年第5期。